法律适用中如何对待逻辑——兼论法条主义与后果主义

杨旻畅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海淀, 100044;

摘要: 三段论作为基础法律论证模式, 虽使法律适用结果具高度可预测性, 但在疑难案件中面临挑战。霍姆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的论断引发对法条主义的反思, 后果主义因考量社会效果应运而生。以申克诉美国案为例, 法条主义与后果主义在处理言论自由与战时国家安全冲突时展现不同裁判路径, 前者强调规则逻辑, 后者侧重实际效果。法律现实主义为后果主义提供理论支持, 但其对法律客观性的批判主要指向司法发现阶段的主观性。借鉴科学哲学中发现与证立的区分, 司法裁判需经历发现阶段(依赖法外价值判断)与证明阶段(通过逻辑建构正当化结论), 二者共同确保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关键词: 逻辑; 法条主义; 后果主义; 发现与证立

How to Treat Logic in Legal Application——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Legalism and Consequentialism

Minchang Yang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As a fundamental mode of legal argumentation, the syllogism endows the results of legal application with a high degree of predictability. However, it faces challenges in hard cases. Oliver Wendell Holmes' assertion that “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has triggered reflections on legalism. In response, consequentialism has emerged as an approach that takes social effects into account. Take the case of Schenk v.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When address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freedom of spee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wartime, legalism and consequentialism demonstrate distinct judicial paths: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logic of rules,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practical effects. Legal realism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nsequentialism, yet its critique of the objectivity of law mainly targets the subjectivity in the stage of judicial discovery. Drawing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iscovery and justific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judicial adjudication needs to go through a discovery stage (relying on extra - legal value judgments) and a justification stage (constructing and justifying conclusions through logic). These two stages together ensure the unification of formal justice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Keywords: Logic; Legalism; Consequentialism; Discovery and Justification

DOI: 10. 64216/3080-1486. 25. 04. 009

引言

司法三段论作为基础的法律论证模式, 是逻辑概念的核心之一。其形式为众熟知: “如果 p, 那么 q”, 其中 p 代表构成法律效果的前提条件, q 代表法律赋予的后果。当案件事实符合命题 p 的描述时, 裁判者即可依据规则必然地推导出命题 q 的结论。这种结构化的表达, 使适用的结果有高度的确定性。然而, 法律总是落后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灵活开放会向法律适用索取灵活的空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其书中写下“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之后, 此句更是被许多法律人奉为圭臬。苏力教授也言, 重要的是“深入体察和理解具体争议中的事实及语境”, 法律的核心

任务是应对世俗世界的利益冲突, 而不是纠结法条文字的含义^[1]。毕竟, 在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今天, 严格遵循司法三段论方法会被人诟病成脱离实际案例、只注重形式关联性的极端的法条主义。例如, 行为人为救突发疾病的邻居, 情急之下砸开紧锁的房门送医。若仅依据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三段论定罪, 会挫伤民众见义勇为的积极性。此时裁判者若考虑判决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引导作用, 最终认定该行为属紧急避险, 不构成犯罪。这种做法便是从社会效果上进行考量的后果主义。后果主义的合理性在于“现有的法律体系为司法裁判留下了不可避免的裁量空间”^[2]。对于后果主义者来说, 社会的需要、道德的直觉, 以及公序良俗、诚实信

用等一系列法原则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逻辑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

那么，逻辑在法律适用中是否真的就无足轻重了呢？笔者认为，既不宜过分夸大后果主义的作用，也不宜完全否定法条主义的作用。前者一旦普遍适用则有架空法律条文的风险，后者忽视了法律适用特需的价值判断。今天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逻辑于法律适用的作用。笔者认为，一个法律人在进行法律适用时，应当追求既要能够洞察社会的头脑填充实质内涵，又要用专业的本领搭建论证框架，从而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

1 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带来的逻辑疑问

立法者希望实体法规则为特定的案件规定特定的结果，确保类案能得到类判^[3]，这种案件就是简单案件。在下级法院审理的大量简单案件中，法官的裁判依照三段论逻辑推理出即可。此时人们对裁判的结果鲜有争议，法律适用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然而，在现实中总会出乎预料地发生未能直接被法律规则调整的新型案件，即疑难案件^[4]。疑难案件打破了常规的审判思路，产生了更加尖锐的法律适用的争论。不难想见，立法者在确立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时，并未预想到如申克诉美国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这般，有人会在战时散发传单反对征兵。立法者在构建战时法体系时，也没料到公民言论自由与战时国家安全保障会产生冲突。可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出现了，那么法官该如何作出裁决呢？对此有两种典型主张：一种是法条主义裁判，需严格依照法条的字面含义与逻辑进行裁决。即便在战时情境下，也优先以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原则性保障为裁判依据，认为只要言论未直接触犯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即应予以保护。另一种是后果主义裁判，侧重于考量裁决可能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在战时背景下，会优先评估言论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且现实的危险”，若反对征兵的言论可能削弱军事动员、威胁国家生存，即便其未违反法条字面含义，也可能判定该言论不受保护。

在笔者看来，单纯的法条主义与后果主义或许都有失偏颇。对于法条主义，在简单案件中尚可生存，而在疑难案件中，如果直接按照法条的字面意思进行逻辑推导，判决大概率并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甚至会导致“疑难案件出坏法”。对于后果主义，这类迎合了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思维，看似体现了法律人的“温情”，而往往使得法官的说理仅为了掩盖自己预先进行判决结果选择的事实，实质上有着架空法规范的风险^[5]。因此，接下来主要需要讨论的是在疑难案件中，逻辑该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2 从法的发现阶段到法的证立阶段看法律适用过程如何对待逻辑

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为后果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像杰罗姆·弗兰克一类激进的法律现实主义者认为，法官和陪审团做出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决策者给法庭带来的强大而隐蔽的心理偏见决定的^[6]。司法裁判并非完全基于客观的法律规则的逻辑推导，而是深受法官个人主观因素影响，法律条文的适用只是表面的逻辑包装。那么，逻辑在疑难案件中究竟该如何运用？

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关于科学哲学中发现和证立的区分，为阐释逻辑在法律中的作用提供了启示：科学家的理论常由猜测引导，但这只属于一种发现；而如果要让猜测为事实所证明，向他人呈示发现，则需要借助推导^[7]。也即是说，科学家发现定理的过程和向大众阐释的过程是各自独立的。这二者的区别同样应用在法律适用领域，即法官进行裁判不是一蹴而就的，也需要经过发现阶段（context of discovery）和证明阶段（context of justification）。在发现阶段，法官有时需要依靠大量法外的因素进行价值判断，例如政治、宗教，甚至法官的个人情感。这是使裁判程序开始的要素，但不是使得裁判成立的依据^[8]。在证明阶段，法官需要提供逻辑建构的理由使自己预设的那个结论正当化。因此，即使法律现实主义者批判法律客观性，那么其批判的也是发现阶段裁判者的心理因素呈现的主观性。然而，就像科学一样，真正使得科学成为科学的是证明过程而非发现过程。

对于疑难案件，在法的发现阶段，逻辑虽不占据主导，但并非毫无作为。法官面对疑难案件，最初的“灵光一现”或基于经验、直觉的初步判断，看似是主观随意的，实则也隐含着逻辑的影子。比如，法官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积累的案例知识、对法律原则的理解，会形成一种潜在的逻辑认知框架，当新的案件事实进入视野，这些知识储备会不自觉地进行初步的匹配与筛选，为后续的裁判方向提供模糊指引。这就如同科学家在进行理

论猜测前,必然已在其专业领域有深厚的知识积淀,那些看似突发的灵感,实则是知识体系内部逻辑关联的一种自然迸发。

进入法的证立阶段,逻辑的作用则愈发凸显,是裁判能否披上合法性外衣的关键支撑。这一阶段,法官需要运用逻辑工具,将发现阶段形成的初步结论,与法律规范、案件事实进行严密的衔接与论证。三段论推理在这里依然是基础且重要的形式,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导出裁判结论,确保结论在形式上符合逻辑规则,具备可检验性与可重复性。同时,面对疑难案件中复杂的价值冲突与规范解释问题,逻辑还能帮助法官梳理不同理由之间的层次与关联,比如运用辩证逻辑对相互竞争的法律解释进行分析、权衡,选择最契合法律精神与社会正义的路径,使最终的裁判不仅在形式上自洽,在实质内容上也能获得正当性证成。

法律现实主义所揭示的发现阶段的主观性,不应成为否定逻辑价值的借口,反而更凸显了证立阶段逻辑运用的必要性。正是通过逻辑的严谨证立,才能将发现阶段可能存在的主观随意性限制在合理范围内,让司法裁判挣脱个人偏见与非理性因素的过度束缚,回归到法律理性的轨道之上。无论是简单案件中对法律规范的常规适用,还是疑难案件里对复杂价值的艰难权衡,从发现到证立的过程中,逻辑始终如一条无形的线,串起了司法裁判的整个链条,保障着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公正性,使法律在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时,既能保持开放与灵活以回应多元需求,又能坚守理性与秩序的底线,维护法治的尊严与权威。

而且,从法律职业群体的发展来看,对法的发现与证立阶段逻辑运用的清晰认知,也有助于法律人提升自身的裁判技艺。新手法官可能更依赖发现阶段的直觉与经验,但随着实践深入,必须学会运用逻辑在证立阶段构建坚实的论证,实现从“凭感觉裁判”到“依逻辑证成”的转变,娴熟地运用司法三段论,真正做到“以理服人”^[9]。这不仅是个人的职业能力的成长,更是整个法律共同体提升裁判品质、增强司法公信力的必由之路。当每一份裁判文书都能清晰展现从发现到证立的逻辑脉络,让当事人与公众看到结论背后的理性推导,法律的权威与正义的实现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与信服,法治事业也能在逻辑的支撑下稳步前行。

3 结语

我们不能因为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就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逻辑与经验并非是对立的。简单案件中,三段论的形式逻辑为裁判提供明确指引;疑难案件中,虽需借助价值判断发现裁判方向,但仍需通过逻辑在证明阶段完成正当化论证。法律现实主义对司法主观性的揭示,恰凸显了证明阶段逻辑建构的重要性——它使裁判超越个人心理偏见,在法律框架内实现社会效果与规范逻辑的平衡。唯有将形式逻辑的严谨性与实质价值的考量相结合,才能在维护法律稳定性的同时,回应复杂现实需求,真正实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可接受性。

参考文献

- [1]苏力.想事,而不是想词——关于“法律语言”的片段思考[J].东方法学,2023,(01):91-101.D0I:10.19404/j.cnki.dffx.20230120.001.
- [2]孙海波.“后果考量”与“法条主义”的较量——穿行于法律方法的噩梦与美梦之间[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21(02):167-177.
- [3]Vern R.Walker. Discovering the Logic of Legal Reasoning. Hofstra Law Review, vol. 35, p.1687-1708.
- [4]孙海波.“后果考量”与“法条主义”的较量——穿行于法律方法的噩梦与美梦之间[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21(02):168.
- [5]孙海波.反思以后果为导向的司法裁判思维——探求一种谦抑限制的标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54(09):111-123.
- [6]Jerome Frank. Law and the modern mind, Routledge, 2007, p. 46-52.
- [7][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178.
- [8]雷磊.法律逻辑研究什么?[J].清华法学,2017,11(04):188-208.
- [9]孙海波.告别司法三段论?——对法律推理中形式逻辑的批判与拯救[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19(04):133-144.

作者简介:杨旻畅,女,汉族,2004年8月,籍贯:贵州省贵阳市,单位全称:北京交通大学,学历: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学专业。